

504293

文教资料简报

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
中文系资料室

· 内部刊物 ·

1980.8 (总第104期)

请交换

目 录

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

目曾

《红楼梦》研究资料

- 1979年《红楼梦》研究中争论的几个问题…………… (1)
- 江苏省政协文史和江宁织造署及楹亭的关系
……………朱 悞 遗稿 (9)
- “靖本”琐忆及其他……………靖宽荣 王惠萍 (14)
- 附：夕葵书屋残页书影及俞平伯先生的批语(见封三)
- 俞平伯致靖本收藏者信两件…………… (23)
- 从胤禛说到小说《曹雪芹》
——与端木蕻良先生商榷……………谢伏琛 (24)
- 曹雪芹佚诗真伪问题真相大白…………… (27)
- 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侧记……………顾文福 (29)

介绍《红楼梦研究书目》和《红楼梦叙录》

附：《红楼梦研究书目》中外文及港台论著目录

..... (32)

现代文学研究资料

我与我的世界（选载·三）.....曹聚仁 遗稿 (64)

太白社..... (64)

我和林语堂吵了嘴..... (68)

关于《晨报诗刊》.....徐重庆 (72)

附：《晨报诗刊》目录..... (73)

《郁达夫著作编目》补遗..... (76)

关于《清宫秘史》作者姚克..... (77)

《救救她》作者赵国庆简介..... (78)

恽逸群自传（续完）..... (79)

二、十年私塾读书生活..... (79)

三、学校教育、就业、结婚..... (98)

波多野太郎教授谈日本汉学界情况..... (112)

本刊试行勘误致酬办法启事..... (76)

读者·作者·编者..... (113)

交流资料简介..... (118)



1979年《红楼梦》研究中 争论的几个问题

去年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评“红”文章，对很多红学问题展开了争鸣。几个主要问题是：

一、关于《红楼梦》的作者问题

《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自从这部名著问世以来，争论不断。但“五四”以来，一般都认为是曹雪芹。近年来又有人提出质疑，戴不凡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中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在石兄《风月宝鉴》旧稿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因而红学界对这一问题又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戴不凡在《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一文中，引畸笏和脂砚斋的批语、裕瑞和程伟元的记载、曹雪芹的弟弟棠村为《风月宝鉴》写的旧序等外证、旁证材料，并列举小说本身所存在的语言（并非用“纯粹北京方言”写的，其中大量吴语词汇）、地点（曹雪芹在修改过程中把贾府从南京“搬家”到北京）、时间（许多事情“时序倒流”）、年龄（以贾宝玉为主的许多人物“忽大忽小”）不统一的“矛盾现象”等四方面的内证材料，作了具体的分析，推论《红楼梦》的写作过程有两个阶段：先是被称为“石兄”、自称为“石头”的作者业已“编集”的一部“自叙”性质的小说，由后来易名为“情僧”的空空道人抄录问世，“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同时又被人题以《红楼梦》、《风月宝鉴》等等不同书名。到了第二阶段才是曹雪芹在石兄旧稿基础上“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改写成为《金陵十二钗》，即今天我们所说的《红楼梦》。也就是说，《红楼梦》原作者是“石兄”，而不是曹雪芹，曹雪芹只是加工修改者。

张锦池不同意戴不凡的说法，他在《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北方论丛》1979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早在乾隆年间，就有不少人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他引述永忠的吊曹雪芹诗、明义的《题红楼梦》小序，以及分析裕瑞自相矛盾的看法等，论证了《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雪芹。他还对脂砚斋们的说法作了具体分析。认为：“胡适认为石头=贾宝玉=曹雪芹，固然不对，而戴不凡认为石头是《风月宝鉴》的撰写者，与脂批中所说的‘作者’无涉，也未免失之于片面和武断。倘若一定要我以简单的公式来表示贾宝玉、石头、作者的关系，那我将写成：贾宝玉≈石头≈‘作者’，亦即曹雪芹。”他还认为“曹雪芹撰写《红楼梦》是始于三十岁左右”，“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作诗的人也就是作书的人”。他并对戴不凡所列举的内证，逐一提出不同看法，说明戴不凡列举部分“内证”的种种“矛盾现象”，不能否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与张锦池持相同意见的，有王孟白、张碧波、邹进先、李少清、蔡义江等。他们分别发表题为：《关于〈红楼梦〉著作权问题》、《驳〈红楼梦〉旧稿为石兄所作说》、《也谈红楼梦的著作权问题》、《脂评说〈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北方论丛》1979年第5期）等文章。这些文章从关于《红楼梦》著作权问题的历史状况与戴文所述内证、外证及竹村（即戴文所说的

“石兄”）其人和关于《红楼梦》著作权的论证方法问题等方面，反驳了戴不凡的说法。

此外，孔祥贤的意见与上述又不同。他既同意戴不凡所提出的《红楼梦》非曹雪芹一手创作而成，而是另有原作者的观点；但又不同意戴不凡认为《红楼梦》原作者是石兄（曹竹村）的观点。他从“脂砚的经历有不少成为《红楼梦》的素材”等七个方面，论述了《红楼梦》的原作者是脂砚。至于脂砚是谁？他表示还将发表文章加以论证。

二、关于第四回“护官符”是否全书总纲的问题

把第四回“护官符”看作全书的总纲，是前些年广为流传的说法。现在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吴颖在《评〈红楼梦〉评论中流行过的几个观点》（《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护官符”仅仅是《红楼梦》在描写典型环境的艺术结构上有一定的提示意义。分析一部小说，典型人物才是最主要的因素，而典型环境不过是典型人物活动的舞台。因此，把第四回“护官符”看作全书的总纲，这就“颠倒了人物和环境的主次关系，颠倒了角色和舞台的主次关系”。

冯宇的《论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一文，仍认为：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也就是指明了该回书的内容体现了以贾府为首的“四大家族”必然衰亡和整个封建制度行将崩溃的政治主题。

三、关于《红楼梦》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小说问题

把《红楼梦》看成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是前些年广泛流传的一种提法，现对这一问题基本上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张锦池的《也谈〈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第1

戟)认为:《红楼梦》所展示的画面,“主要是由三组矛盾交织组成。即:封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封建正统势力和叛逆者的矛盾。其中,前两组矛盾是基础,后一组矛盾是主导。”因为《红楼梦》由这样的三组矛盾所组成,所以他认为“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政治历史小说来读”。蔡义江认为:对“政治历史小说”的提出,有其要强调的特定含义,如果不说清楚这含义是什么,便作为一般名词来指称这部小说,难免会令人费解,甚或可能引起某种误解。比如以为小说中的人物故事都是在影射康、雍、乾时期的某些政治历史事件。所以他“赞成不笼统地称之为‘政治历史小说’”。

吴颖则不同意上述的观点,他认为,按照逻辑常识,一部作品必须既是“政治小说”,也是“历史小说”,那才会是“政治历史小说”。但是,《红楼梦》基本上不是直接、正面的写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的。因此,只能说它是具有深刻政治意义的小说,决不能叫做“政治小说”。另一方面,《红楼梦》“并没有任何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是历史上有过的,也不是正面写政治生活、政治斗争的”,当然不能叫做“历史”或“政治史”,也不能叫做“历史小说”。因而,他认为《红楼梦》“更不能叫做政治历史小说”。

四、关于“爱情掩盖政治斗争”的提法问题

对这一问题,现有两种看法。蔡义江认为:以假隐真,是这部小说不同于别的小说的地方。它不仅是指一般的典型化的文艺形象与真人真事的关系。否则,作者何以不把单独接驾四次、也有一个性情相同的宝玉、后来也被抄没的江南甄家,索性用典型化的方法集中概括到都中的贾府里来呢?

他认为“掩盖政治斗争”是不能否定、也无法否定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理解、说明，即不穿凿附会，也不否定爱情等问题本身具有的独立意义。

张长仓、孙国良也认为：曹雪芹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得不故意设置了一些迷障并用“假语村言”的隐晦之笔，从而增加了理解《红楼梦》主题的困难。

丁振海则认为：所谓“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不过是表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既利用了自己切身经历的生活材料，而又对这些“真事”加以艺术的虚构，加以概括和集中，加以典型化的处理罢了，并不包含任何神秘莫测的成分在内。

五、关于《红楼梦》情节结构的主线问题

这是一个新争论的问题，现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1. 认为宝黛爱情悲剧是小说的主线。

刘梦溪认为：“《红楼梦》的总体艺术结构，是以宝、黛建立在反封建基础上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通过对荣、宁二府为代表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衰亡过程的描写，深刻批判了封建社会末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

李春祥也认为：“宝、黛爱情婚姻悲剧决不是《红楼梦》的附属部分，而是贯穿全书的情节主线或中心情节”。因此他指出：“离开了宝、黛这条主线，《红楼梦》就不成其为《红楼梦》，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条别的情节线索能够贯穿全书”。

冯宇也认为：“《红楼梦》中宝黛爱情的悲剧，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它作为书中的一条主线，乃是为了表现反封建的政治主题，为总纲服务的”。还指出：《红楼梦》“这

部思想和艺术结合得最好的中国古典小说，如果抽掉了宝黛爱情悲剧的主线，就等于拆除了这座艺术楼阁的顶梁支柱。很难想象，只留下其它线索，组成各种矛盾以反映阶级斗争，会成什么样子？那就必然会失去其寓意深邃的思想光彩和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2. 认为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小说的主线。

张锦池认为：“一部《红楼梦》是以贾宝玉的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心，以贾宝玉和贾政等人在人生道路问题上的叛逆和反叛逆为主线，以四大家族衰败为结局，全面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阶级的分化，从而预示了封建主义制度的必然溃灭，依稀透露出近代资本主义新纪元的微光。”并指出“因为贾宝玉叛逆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与贾府的兴衰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认为《红楼梦》的主线是以贾府为首的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当然也就不无一点道理。然而，我总觉得这种观点失之于普泛，没有触及问题的枢纽；而抓住枢纽，这恰恰是论述一部作品的主线的要求”。

3. 认为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衰亡是小说的主线。

石昌渝认为：“《红楼梦》的主题不是爱情。如果把《红楼梦》的主题看成是爱情，五十八回至六十三回的描写就显得多余而且琐碎；如果确认《红楼梦》写的是兴衰，爱情也服务于兴衰，那就不难看到这六回文字是多么必要和多么深刻了”。因此他认为“兴和衰的矛盾贯穿在小说的始终，是《红楼梦》的主线”。

对这一问题，蔡义江则认为“小说的原作与续作并不是一线贯串的。前后作意也不一样，矛盾的地方很多。如果不加区分，硬把一百二十回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讨论其结构

的主线是什么，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如果要讨论原作的结构主线，则非先探索八十回后佚稿的情节内容不可”。

曹雪芹 六、关于后四十回的评价问题

这是一个历史上的老问题，现有两种不同看法。

李春祥认为：“高鹗续作的后四十回，在保存宝黛爱情悲剧结局这一重大情节上还是成功的”。那些“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的续书或改作被读者所鄙弃，而只有高氏的续作和前八十回一起流传下来，这件事情的本身就说明了人民群众对后四十回的肯定评价。并指出：“高氏续作也有违背曹氏原意的败笔，如宝玉中举和黛玉说八股文中有好文章的‘混账话’之类”。

胡文彬则认为：“续书也写了四大家族的破败、死亡、罢官、抄家等类故事，看上去颇有与前八十回某些伏线相符的地方，但这只是某些情节上的相符而已。续书的主流、本质则是与前八十回大相背谬的”。还认为，“从根本上说来，续书的主要方面及其实质是宣扬复旧和倒退”。

李凌认为：高鹗续书中贾府的结局却和曹雪芹的原意完全背道而驰：贾府虽一度被抄，但很快就“沐皇恩”，家道复兴；作恶多端的贾赦、贾珍和害了两条人命的凶手薛蟠，也遇赦归来；宝玉中了举人之后才出家，还留下了遗腹子，预示他日“兰桂齐芳，世泽绵延。”还指出，“高鹗写人物结局，表面上大都与曹雪芹意向相切合，若细加推究，便可看出多半都是貌合神离的”。

七、关于王冈所绘曹雪芹小像和陆厚信所绘曹雪芹

小像真伪问题

关于曹雪芹的画像，已发现有两幅：一为手卷，王冈绘，

李祖韩藏；一为册页，陆厚信绘，河南省博物馆藏。对其究竟是真是假，也一直存在着争议。

宋谋场认为：“陆厚信所绘的小照，是国内现存唯一的曹雪芹同时画家所画的曹雪芹画像”。他在《陆厚信〈曹雪芹小照〉辨》一文中，通过对原画概况及购藏经过、吴恩裕最初的意见、郭老的两封信、周汝昌的独特见解等九个方面的论述，得出了上述结论。

陈毓黑、刘世德不同意上述意见。他们在《论曹雪芹画像真伪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两个重大疑点，并作了论证：第一，画中人的相貌和曹雪芹全然不符，两幅画像所作时间，应都是曹雪芹生活的后期。这两幅画像所画的人，都脸圆而胖，相貌平庸，无出众之处，和我们所知的描述曹雪芹相貌的可靠材料，确实差得很远。第二个重大疑点是这两幅画像的题咏者均为当时的达官贵人和翰苑名流，他们和久困山村、穷愁著书的曹雪芹都有交往，一起为他题像，并且还有聘他入两江总督幕府之事，与我们所知道的曹雪芹的情况完全不符。文章以敦诚的挽诗作证据，说明曹雪芹在他生活的后期，并未和那许多闻人和名流交往。他的朋友只有敦敏、敦诚、张宜泉等人，他们既没考中什么举人和进士，当时也都无有一官半职。曹家的阔亲戚早已把曹雪芹视同陌路之人了。因此，他们认为：“陆厚信和王冈所绘的都不是曹雪芹的画像”而是“与曹雪芹同时代的俞楚江”。

上海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室 俞海宜整理

（原载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资料与研究》

1980年5月第27期）

江苏省政协会址和 江宁织造署及楝亭的关系

朱 楔* 遗稿

现在的江苏省政协会址(南京长江路292号),是过去的两江总督府;而清朝的两江总督府,又是就清朝“江宁行宫”(即所谓大行宫)的一部份改建的;清朝的“江宁行宫”,则又是就清初康熙时代曹寅的江宁织造署扩建的。所以,现在江苏省政协的会址和曹寅当年的江宁织造署,有历史上的渊源关系。

当初曹寅父子都做过江宁织造。江宁织造在当时是一个肥缺。他们父子二人,都以清康熙亲信的关系,用江宁织造的名义,开府南京,借以和江南一般士大夫知识分子来往。清初南京是明朝遗老集中的地方,曹寅一方面和他们诗酒酬酢,笼络人心,另一方面也在暗中监视他们,掌握他们的动态,随时替康熙帝做一些情报工作。曹寅的父亲曹玺,曾在江宁织造署内盖了一座花园,筑了一座亭子,叫做“楝亭”(据南京一些地方志记载,曹玺筑亭课子,树楝其侧,名曰楝亭)。到了曹寅的时代,楝亭遂成为南京的一个文化中心,当时一些江南名士,如尤侗、余怀、高士奇、王鸿绪、王丹

* 朱楔 (1906—1968.7),原江苏省第三届政协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南京市委委员、南京图书馆馆员。著有《江苏的名胜古迹》、《南京的名胜古迹》。文化大革命中不幸逝世。1978年12月29日举行骨灰安放仪式。这篇文章是他的遗稿,本刊转自江苏省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第四辑(复刊后的第一辑)。

林等，都和他往来，互相唱和。曹寅请当时有名的画家，绘了楸亭图，到处征求海内名士诗人题咏，叶燮、姜宸英等都作有《楸亭图》诗文；王士禛、纳兰性德、陈恭尹、梁佩兰等都题了诗词。曹寅又选了自己的诗章，刻了《楸亭诗抄》。他做过好几任江宁织造。他的孙子、《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便是生在江宁织造署内的。

关于江宁织造署和“楸亭”的地点，过去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错误的；一种是正确的。

错误的一种说法，是根据清同治《上江两县志》，该书卷五写道：

淮青桥东，又有织造署。昔织造曹完翁（曹玺）筑亭课子，树楸其侧，名曰楸亭。

又卷十一写道：

织造衙署，（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工竣，仍就淮青桥东旧基建造，房屋一百五十二间，走廊八十三号，辕门牌楼二座，荷花池一座，太湖山石一座，旗杆石狮各一对。

造成错误的原因，是修地方志的人（莫友芝等人），误以清乾隆三十三年以后改建在淮青桥东（今八府塘）的江宁织造署，为康熙时代曹寅父子任内的江宁织造署。因为他们没有查一查档案，甚至没有查考前代的江宁府志，所以造成这一错误。后来有些文人驱车过八府塘，凭吊“楸亭”旧迹，甚至联想到《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南京宁、荣二府，当然更是错中之错了。

正确的一种说法，是说曹寅时代的江宁织造署和“楸亭”在大行宫，即今江苏省政协会址，长江路292号。它的根据是清嘉庆《江宁府志》卷十二。该书建置篇“江宁行

宫”一条写道：

江宁行宫，在江宁府治利济巷大街，向为织造麻署。圣祖（即康熙帝玄烨）南巡时，即驻蹕于此。乾隆十六年，大吏改建行署，有绿静榭、听瀑轩、判春室、镜中亭、塔影楼、彩虹桥、钓鱼台诸胜。

又“江宁织造署”一条说道：

江宁织造署，旧在府城东北督院署前。乾隆十六年以改建行宫，时藩司兼管织造，故无署。乾隆三十三年，织造舒，买淮青桥东北民房，改建织造衙署。

这里交代的很清楚了：所谓“江宁行宫”（即大行宫）是就江宁织造署改建的，前门在利济巷大街；而淮青桥东边的江宁织造署，则是乾隆三十三年以后方才迁建的。又根据清乾隆《南巡盛典》中所绘“江宁行宫图”，有“大宫门”、“二宫门”、“行殿”……六七进；凡分三路，东路是行宫主要建筑所在，向南突出，大概是原来的江宁织造署本身；中路较狭，是偏殿所在，前有“箭道”；西路是一座较大的花园，有水池、亭榭、戏台，大概即是曹寅的“楝亭”所在地。考其地点和方位，正是现在省政协内西花园的地方。

清康熙帝玄烨六次南巡，除康熙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驻蹕将军府外，其他五次南巡（康熙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都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这就是《红楼梦》里所说的江南甄家单独接驾四次的真实背景。曹寅有《楝亭图》四卷（现归张伯驹收藏）。凡是当时诗人名士，都网罗殆遍。现在略列每卷书画姓氏如下：

第一卷 图三：黄璜、张叔、禹之鼎绘，并自题诗。

题咏十四：纳兰性德、顾贞观、潘江、吴騄、王方岐、

唐孙华、陈恭尹、吴文源、方仲舒、顾彩、张渊懿、方嵩年、林子卿、袁璵。

第二卷 图三：沈宗敬、陆谔、陆图绘；张景仲题诗，戴本孝绘并自题诗。题咏十五：姜宸英、毛奇龄、张芳、杜浚、余怀、梁佩兰、秦松龄、严绳孙、金依尧、王丹林、顾图河、姚廷恺、吴农祥、费文伟、王霭。

第三卷 图三：严绳孙、恽寿平、程义绘并自题诗。题咏九：何炯、徐乾学、韩菼、徐秉义、尤侗、杨雍建、王鸿绪、宋荦、王士禛。

第四卷 图一：禹之鼎绘并自题序。题咏八：尤侗、徐林鸿、冯经世、田时发、邵陵、许孙蕃、潘义炳、石经。

这已经是洋洋大观了，几乎康熙年间江南一带所有诗人名士，甚至连北方的纳兰性德，山东的王士禛，岭南的陈恭尹、梁佩兰等，都包括在内，然而这四卷似乎还不是全璧，至少还有一轴，其中应该包括查二瞻的画，叶燮的《楸亭记》，倪灿、吴之振等人的题诗，已不知去向了。

叶燮的《楸亭记》见《已畦文集》，他描写“楸亭”，不过寥寥数语：“公（指曹玺）在事历二十余年，其初至也，手植一楸树于庭；久之，树大可荫，爰作亭于其下，因名之曰楸亭。公以暇辄偃息于斯，以寓其先忧后乐之意”。至于这些题咏，都不过是一些应酬之作，极少佳章，现在只录严绳孙跋诗一首，聊存一格而已：

闻道司空旧草亭，至今嘉树想仪型。
分明一片棠荫在，遥对钟山万古青。

这一座江宁织造署和它的花园，乾隆十六年南巡时，大

吏改建为行宫，从此遂有“大行宫”之名。大吏为了逢迎清帝意旨，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行宫的范围很大，东南一直到利济巷，西北包括现在的西花园在内，这是从《南巡盛典》中《江宁行宫图》可以看得出来的。于是，“楸亭”遂圈入大行宫的范围去了。

乾隆帝六次南巡，花钱如水，而地方官员为了接驾盛典，遇事敲诈勒索，贪污中饱，更加重老百姓负担。乾隆帝到了晚年也颇有悔意，下诏以后不许再举行南巡。于是行宫的一部分，就改为江南总督署，行宫西面的花园，有一座石舫，乾隆题曰“不系之舟”，也划入江南总督署的范围，就是现在的西花园。

当然，这一带地方，因为经过太平天国时代改建天王府（它的范围要比行宫大好几倍）；后来又经过曾国藩改建两江总督府，变动十分巨大，想要详细考定过去建筑遗址，指定它的确实地点，是不太容易的。但是根据以上所述沿革，我们仍然可以考出：江宁织造署本身，在现在江苏省政协会议址的东面偏南，前面直到利济巷。而楸亭和行宫的花园，则即在西花园一带。后来这里又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作为一个文物保护单位，就更有重点加以认真保护之必要了。

· 红楼梦研究史动态 ·

红楼梦研究史是一个新开辟的领域，已有一些同志开始作系统的评述。薛瑞生同志在《西北大学学报》今年第一期上发表《给胡适在“红学”史上以应有的地位》一文，认为胡适在红学研究上是有功有过；单就考证而言，是功大于过的。对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既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也不能简单地全盘肯定，要做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新发现的“靖本”
直一南京，大外周游的官眷。事蹟之費則未詳。旨意帝
繼繼南》人。其
蓋“亭前”，其下。前未出書言以而《國官言宅五》中《典

“靖本”琐忆及其它

靖宽荣 王惠萍*

我家这个旧抄本自一九五九年毛国瑶同志借阅并摘录其为有正本所未载的150条批语以来，引起了国内外红学研究者的重视，习惯上称之为“靖本”。因为此书现已不存，外界颇为关心，为了说明事实真相和个人的一些看法，乃草为此文。如有不明、不当之处，恳请前辈方家予以教正。

笔者幼年曾听祖父（名松元，字长钧）说过，我家原籍辽阳，本不姓“靖”，因祖上有军功遂赐姓“靖”。后来，始祖由北方迁到江南，在江都落户，居处后称“靖家营”。约当乾嘉之间，我家这一支又由江都迁往扬州城北之“黄金坝”。清末，家已败落，约在一九一〇年祖父只身来南京谋生。先在轮船上当学徒，后因修筑津浦铁路，转到铁路上工作。他当时的工牌是“7号”，意即第七个中国工人。

我有一位伯父、四位姑母。除大姑、二姑外，伯父和另两位姑母都有一定的文化。四姑母靖英，毕业于镇江临江师范，伯父靖应鹏（又名靖鹏）毕业于南京某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前伯父与四姑母一直在浦镇的小学任教，伯父曾一度任校长。父亲靖应鹄，初中毕业，解放前在浦口火车站工作。

我祖父从扬州迁来南京时，浦口还是江滩。他首先是在

* 本文作者是“靖本”收藏者靖应鹄的儿子和儿媳。关于“靖本”及其批语，请参看我系资料室1976年5月编印的《红楼梦版本论丛》301—328页各文。



浦口大马路后面的巷子盖房居住，这条巷子就叫“明远里”，大概是由靖氏堂名叫“明远堂”而来。

一九四七年伯父病故，当时他们兄弟并未分家，所有书籍和什物都归我父亲。一九五五年我父亲搬到浦镇东门，当时房屋逼仄，书籍什物都堆放在阁楼上。一九五九年毛国瑶同志就是在阁楼上看到这部《红楼梦》抄本的。当时存放在阁楼上的书和什物，有一部分在文革前已被我母亲陆续卖给收破烂的了，抄本《红楼梦》是否被她卖掉，后来问她时，她已记不起来了。记得她卖掉过一些“废铜烂铁”，其中有一只明宣德年间造的香炉，我父亲知道后悔恨不已。我父亲对古铜器略有了解，对书籍的价值却几乎一无所知。

一九五九年毛国瑶同志借阅《红楼梦》抄本时，曾摘录了150条批语。一九六四年他将这些批语寄给北京俞平伯老先生，俞老回信说：“这些批语很有价值”，毛国瑶再来我家问到这部《红楼梦》抄本时，已经找不到了。由此可知，抄本失落的时间，大概在1959—1964年之间。此后，他又将所抄批语分别寄给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三位，并通信讨论其中的某些问题。由于原书不存，国瑶同志未将批语发表。当俞先生来信问及这部抄本时，我父亲曾在所有藏书中仔细查找。抄本没有找到，却在另一部旧书中发现了一张纸条，记录了一条批语。俞老函告说这条批语很重要，国瑶同志就劝我父亲把这一纸条寄给俞先生，请他转送给文学研究所保存。我父亲立即寄了去，俞先生在残叶旁写了批语，并将它拍成照片，分送给我们一张。至今这张照片和俞先生的来信我们都保存未失（书影见本期封三——编者）。这时，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三位先生都不断来信，尤其周汝昌先生来信最多，索